

东林党为何没能拯救明朝

核心阅读

当党派分歧超越了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之后，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东林同非东林严重对立，双方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泄私愤多于国家大义，这样的政治生态必然危害国家社稷。在明末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东林党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难的策略，也没能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 邓 涛

东林本合道义

作为一个深刻影响明末政治生态官僚集团的客观存在，东林党的性质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党之间。“朋党”一词，先秦时即已出现，《韩非子》中有言：“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认为朋党是朝臣结党营私、干乱纲纪的行为，不利于君主统治。实际上，万历朝第一个被冠以“党”的官僚团体并非东林党，而是万历前期张居正去世后以湖广官僚为主体的“楚党”。张居正去世后，政敌交相揭发张居正的执政“劣迹”，此后，受张居正提拔和信任的湖广籍官僚大多受到罢斥，故时人评价：“江陵败后，楚党坐斥殆尽。”显然，这里的“楚党”也是贬义词。《朋党政治研究》一书提到：“对掌权的大臣来说，千方百计援引同乡的进士和举人则是扩大个人权势、维护乡里利益的极好途径。”结党需要有共同的利益或一定的纽带，同乡之情则成为官僚结成朋党的天然资源。结合张居正执政时期可知，彼时虽然有湖广籍官僚群体依附在张居正身边，但尚未形成党争，只是存在一个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核心的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涵盖张居

正的部分同乡、同年和门生。

北宋时，欧阳修向宋仁宗上《朋党论》，认为朋党并非全是坏事，强调小人为朋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君子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如以后世对东林党的主流评价而言，东林党应当属于欧阳修口中的“君子朋党”，即这类朋党尊崇道义、注重名节，会为社稷安危和天下太平而同心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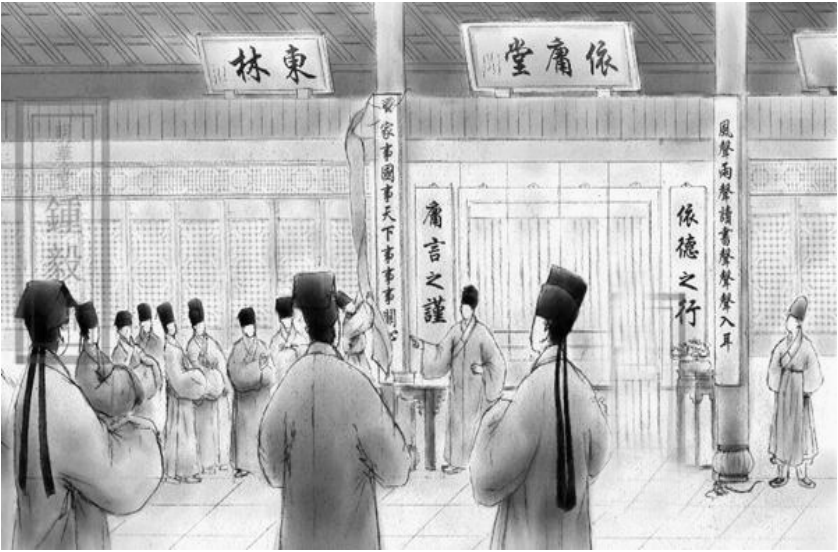
相比唐朝“牛李党争”以入仕方式和个人身份作为区分的标准，明朝后期“朋党”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尽管东林党成员中有很多非南直隶士人，但从东林士人的领袖以及各类活动的发起者而言，南直隶地区特别是如今苏南地区的士人是东林党的第一大地域来源。这是因为源于地域上的便利，即东林书院的影响范围，往往先影响到无锡周边，同时由于苏南发达的农业孕育了众多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文化发展拥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此外“乡党”意识也使得籍贯相近的人抱团取暖。

党争反辱士林

与东林党相对应的政治团体，是在史书中处于“邪恶”一方的齐党、楚党和浙党以及宦官集团，而前三党有时也被概称为“阉党”。齐楚浙三党是以地域为主要区分依据，也印证了东林党自身具有一定的地域属性，这一属性并未因为有其他省份士人的加入而完全稀释。

结合当下的研究看，对东林党整体持正面的看法是公正的。东林党在抑制矿监税使、为民申冤、化解地方矛盾等方面做了不少好事，很多东林士人也有理想士大夫的品格：忠诚、直谏、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此外，东林党在选贤用能、经济改革等方面也有自己的创见。但因此说东林党是正义的，齐楚浙三党乃至宦官集团就是邪恶的，也不一定符合实际。在中国古代史书的叙事模式中，宦官群体多为负面形象，宦官权力过重的时期往往被形容为黑暗时期。原因除了太监本身在身体和心理上存在缺陷、一些言行的确恶劣外，还源于宦官集团本质上是同士人集团对立的。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君主所能分出的权限是有限的，宦官权多，士人权自然就少，士人集团很难同宦官集团愉快地平分君主施放的权力。因此，士人在史书中叙述宦官时，也多作负面描述。

东林党作为明朝后期最大的政治团体，掌握着“清议”这一工具，换句话说，东林党掌握了明末主流话语权的主要媒体。他们可以自己以己的标准乃至自己的判断品评彼时的政治人物，给对方划分政治阵营并做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清议”本身缺少外部监督，且主观性较大，故东林党所品



评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换句话说，被东林党人冠以“邪恶”之名的齐楚浙三党，多少也有些被“黑化”。

以在野人士为主组成的“清议”势力，通过品评朝政来影响国家政策，显然是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东林这一政治势力在形成的过程中，促使了反东林势力的结盟。东林人士在品评朝臣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在朝士人分了类，多依据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清人赵翼曾言：“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这种价值判断标准，是有局限性的。这种情形，使得部分非东林人士不得不结党自保，使得明末“党争”愈演愈烈。东林同非东林严重对立，双方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将视角放到东林党的死敌魏忠贤身上，与其说是魏忠贤挟持天启皇帝、专擅弄权，不如说是天启皇帝主动将一些权力放给魏忠贤，一方面天启帝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朝政，投身一些“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天启帝也许意识到强大的东林势力对朝政的干预乃至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东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齐楚浙三党最终依附宦官集团，一方面是反映了这些士人集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人格，开始依附宦官集团，成为天启帝的基层支持者。另一方面，齐楚浙三党依附宦官，又何尝不是东林士人的逼迫呢？经过万历朝的政争，双方依然水火不容、缺少包容。

将东林与齐楚浙三党的对立，同唐朝后期牛党和李党的对立进行对比。学界一般认为牛党代表了新兴庶族地主，代表新生力量，李党代表门阀世族，多少有一些没落。但依然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虽然两派士人出身和政见有差异，但即便一党胜出，也未使当时的政治显现出太多的新气象，没有扭转唐朝下行的国运。当党派分歧超越了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

之后，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意图实现唐朝中兴的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显然对长期的党争感到十分不满。

义理未解危难

东林与齐楚浙三党的对立一直延续到崇祯朝和南明。崇祯帝处死了魏忠贤，压制了依附魏忠贤的诸党朝臣，东林党重新得势。然而，在明末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东林党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难的策略，也没能挽救明王朝于危亡。崇祯帝从最初极力压制宦官集团，到后来发现士人不可尽信、宦官也可为我所用，开始对宦官委以重任。崇祯末年，崇祯帝“命唐通同司礼太监杜之秩守居庸关”，这同此前明朝向九边派出镇守太监监督文官巡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皇帝觉得文臣并非都忠诚、宦官也非皆不可重用。

在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潜在威胁，皇后、嫔妃、外戚、阉人、文臣、武将等等皆不可尽信。众人皆不可信，故众人皆可不忠。崇祯帝派出的司礼太监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关投降了大顺军。北京城破后，崇祯帝在自缢前感慨：“朕遭德藐弱，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言语虽然不无推脱责任之嫌，但显然崇祯帝对包括东林士人在内的士人集团十分失望。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澄源曾评论崇祯初期的东林党：“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刻剥小民、遥执朝柄、广庇匪类。”言语或有过激、问题或有夸大，但亦可反映东林党人的一些问题。



名人，尤其是著名历史人物，历来备受故乡人的推崇与爱戴。当下，很多地方打出名人故里的招牌，不外乎是借名人效应吸引眼球，有助于招商引资与旅游。于是，有些历史名人竟然被争抢，出现多个故里之说。比如孙武，就有广饶、惠民、博兴、临淄等地声称为其故里。应该说，孙武故里只有一处，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众说纷纭也是情有可原。

然而，有些历史名人却被故乡人冷落，阮大铖就属于此类典型。他是明末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故里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问题，说起来颇有意思。

按《明史》说法，阮大铖为安徽怀宁人。但是，《明史》是清代桐城人张廷玉主持纂修的，定稿于乾隆四年（1739年）。张廷玉担任《明史》总纂时，官拜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代表朝廷最高权威。他所拍板定案的事情，可谓铁板钉钉。是故，清人大都以为阮大铖是怀宁人，如《池北偶记》称之为“阮怀宁”。

《明史》把阮大铖这个名人归于怀宁，怀宁人不仅不领情，而且耿耿于怀，总想把案子翻过来。终于到1915年，参与修怀宁县志的上百名举子秀才经过多方考证，认定阮大铖并非怀宁人，指明阮大铖乃桐城人，最有力证据便是“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怀宁人把阮大铖踢还桐城，桐城人却不认账，官方县志拒不接受。抗日战争时期，桐城人房梦觉闲居于浮山脚下，写了一本小书《浮渡名胜志》。书中有一段记述：“关外有五云岩，岩在翠华之上，亦曰阮集之读书处，为明末邑人阮大铖读书所也。”

浮山之上，“阮集之读书处”的题刻至今尚存。种种迹象表明，“阮怀宁”应是桐城人，他是被同乡张廷玉踢了出去，硬塞给怀宁的。说实话，张廷玉把阮大铖踢出县籍，不免有“以权谋私”之嫌。这个“私”，无非是顾及自己家乡面子，为了不让自己丢脸，就把阮大铖踢给邻县。当然，怀宁人也要顾及自己的脸面，桐城踢出来的人，凭什么强加于怀宁。于是，“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状况不断延续下去，阮大铖的籍贯至今悬而未决。

同样是名人，孙武故里被四处争抢，而阮大铖故里却两边推搡？仔细思量，一个人身后荣辱，无疑取决于生前表现。看阮大铖生前所作所为，就知道问题的答案。

阮大铖以进士入仕，起初列籍东林党，后来依附魏忠贤。魏忠贤失势后，阮大铖被罢官，避居安庆、南京。其间他努力与复社、东林成员修好，在复社领袖张溥为其师周延儒复相而奔走活动时慷慨解囊，表示愿意重归东林。周延儒复相（再任内阁首辅）后，东林党反对周报答阮大铖，使他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不过他所举荐的马士英得到了重用。崇桢皇帝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马士英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成为南明弘光王朝首辅，阮大铖得其力荐，出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升任兵部尚

阮大铖故里之谜

□ 陈良

书。马士英、阮大铖执掌南明政权，如果他俩以大局为重，励精图治，不说收复故土，哪怕保住南明半壁江山，也是功德无量。可是，朱由崧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苟且偷安，终日饮酒作乐。马、阮二人竟然公开卖官鬻爵，把小朝廷搞得乌烟瘴气；阮大铖更是大兴“党狱”，对复社、东林大加报复。如此君臣，何以为南明续命？南京沦陷后，阮大铖南逃。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军渡钱塘，阮大铖降清，病逝于随清军南征途中。

《明史》将阮大铖划归奸臣行列，从他为人反复、品格低下、大节有污来看，可谓实至名归，一点也不冤枉。客观地说，阮大铖颇有文学才华，无论诗文词曲，样样拿得出手。他交游广泛，与史可法、文震孟、张岱、范景文等名士皆有唱和。创作戏曲传奇十余种，至今尚存《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合称《石巢传奇四种》。

然而，仅有才华并不能使人流芳百世。阮大铖之所以不受故乡人待见，是因为他有才无德。德才兼备，一直是中国古代评判人物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司马光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洞悉历史，深刻认识到用人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如若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因为有才无德之人对社会危害远比无才无德之人更为严重。蔡京、秦桧、严嵩、阮大铖之流，都是有才无德的小人，他们一旦位高权重，就会做出许多危害国家或社会的事情。当然，小人能凭其才一时得势，但不能永久风光，毕竟“历史是混不过去的”。那些做过坏事的奸佞，无论多么有才，终究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被后人所唾弃，没有人会因为故乡出过阮大铖式名人而自豪。

历史散叶

迷失之危

□ 崔庆

秦孝公的“求贤令”暗藏着一篇秦君小传，“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这段低潮期起于秦厉共公，“不宁”暗生，那时的秦国究竟出了什么情况呢？

大时代的国家竞争必须凝神聚力，准确寻找发力的突破口，一旦整体战略迷失，四面出击，就会劳而无功。秦悼公留下不薄家业，厉共公也非庸主，但动荡的大时代诱惑太多，厉共公似乎陷于此套，想法一多，脚法就凌乱了。

公元前476年，秦厉共公继位，西方还是一片平静，东方已经热火朝天，诸侯列国之间竞争节奏越来越快。吴越两国进入对决阶段，数年之内，风头正劲、甚至曾经力压齐、晋、楚等大国的吴国，亡于迅速崛起的越国。吴越之争牵动大国棋局，中原正在酝酿新一轮风暴，这一切似乎离秦国很远。厉共公二年，西南蜀国以丰厚财物主动结交秦国，秦国不仅坐享安宁，甚至还找到了大国的感觉。这恰是迷失的开始。

自知者明，自迷者危。厉共公五年（公元前472年），楚人来了；六年，义渠人来了。秦君似乎成为了比

周天子还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秦国似乎成为了可以左右天下时局的头号大国。其实，秦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国平衡战略的砝码。义渠强大，试图统领各族各部，必然着眼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合，同为民族的绵诸感到巨大压力，向秦国求援。义渠需要秦国置身事外，保持中立。晋国的四大家族智、赵、魏、韩正在暗中角力，试图瓜分晋国，希望秦国此时不要“多管闲事”。楚国惠王攻灭陈国，击败巴国，正在“打怪升级”，渴望有充裕时间来消化胜利果实。各国都希望秦国这头“猛狮”再多睡一会儿，给他们留出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周边各国都在风生水起，大秦却悄然无声。公元前467年，秦厉共公继位十年了，蛰伏许久的秦军终于出击，向东伐晋，攻取了魏城。秦的军事行动牵动各方神经，列国不约而同地继续实施“安秦”策略，秦厉共公十四年，晋国、楚国再次来访，并以大量财物交好秦国。

秦晋相安，晋国躯壳中的魏赵韩是最大受益者。尤其魏国与秦接壤，秦魏有潜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魏国抓住时机，苦练内功，站稳脚跟后，

立刻把秦国作为最主要的对手。秦厉共公时代，秦国的老对手晋国内斗惨烈，传统“六卿”变为四大家族，进而赵魏韩在晋阳之战中击溃智氏，三家分晋。秦厉共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52年），晋国智氏族人智开率众逃亡到秦国，这是天赐的疲晋良机。秦厉共公原本可以像康公、景公一样，充分吸收晋国归附力量为己所用，持续分化并不稳定的魏赵韩三家势力，但是当时的秦国对此无所作为。

晋、楚大献殷勤，秦国被表面现象干扰了视线，把关注点转向了周边民族。秦和戎族恩怨纠葛，历代秦王只要条件允许，都会策划整合戎族各部。但是秦厉共公缺乏整体考虑，伐戎战略连环出错。义渠、大荔、绵诸是戎族主要部落，其中义渠最强。秦应该联弱攻强，在动态平衡中削弱戎族各个部落。但实际操作中，秦先弱后强，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秦军攻灭大荔；二十年，秦厉共公亲自率军讨伐绵诸，不经意间把“大块头”义渠放在了最后。厉共公也意识到了此举的重大隐患，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调动秦军全力攻伐义渠。虽然秦最终俘获义渠王，但义渠已经

坐大成势，并在躁公时代对秦发动了大规模反击，成为和秦国长期纠缠的掣肘之患，就如一颗顽强的“牛皮糖”，在惠文王、昭襄王时代多次给秦国带来麻烦。

这个时期，秦缺乏清晰的整体战略规划，多欲而无定法，事倍而功半。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军占据了汉中南郡，修城守备，不仅震慑蜀、巴，对楚也形成了巨大压力。南郡位置敏感，曾反复易主，是秦、楚、蜀、巴之间的战略要地。秦楚尚好，不应过早暴露自身的战略意图，可在南郡留一“虎口”，作为缓冲区，来日方长。秦占南郡，看似下了一招“先手棋”，实际是在错误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

厉共公应牢记穆公之策，分清敌友，抓住秦晋竞争的主要矛盾，明确主要战略，持续东进。这一阶段，楚国是可以依靠的伙伴，秦应该不断巩固和楚国的战略合作关系，维持向南战略方向的平稳。同时，向东战略方向要积极进取，乘三晋初立，联合赵韩，甚至远交齐国，全力削弱魏国，由河西进兵河东，继而窥伺中原。对周边民族，应该顺势推舟，联手大

荔、绵诸，剿灭义渠，后缓图戎族诸余部。若行此三策，秦国景象会大不一样，昭襄王时代的强秦或许会提前出现。

历史没有假设，厉共公的战略摇摆，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秦国精英阶层的不满。再加之秦国内部改革迟滞，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转型远落后于各国，国内“不宁”因素渐渐酝酿、激化，在怀公、出子时代总爆发，以至于日后秦孝公深以为病。

没有稳定的顶层国家战略，全力解决单一目标反而可能对整体格局带来巨大伤害。秦厉共公时代，秦屡屡出击，但图变未顺势，求进未得法，忙碌而少功，遂成迷失之危。厉共公去世后仅仅二年，南郡叛乱，脱离了秦国的控制；魏国成为战国首强，三置秦君，秦在黑暗的低谷还要摸索整整一个甲子。

